

2022年上海法院行政争议实质解决案例

(目录)

一、陈某某诉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特殊工种 工作年限认定案.....	40
二、姜某诉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湖南路派出所行政 处罚决定.....	43
三、邱某诉华东师范大学退学批复决定案.....	46
四、王安某、王庆某、王淑某、王定某诉上海市虹口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征收补偿协议案.....	49
五、陆某某等诉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案.....	52
六、朱某诉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房屋所有权登 记案.....	55
七、毕某诉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继续 履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	58
八、某汽车公司诉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服 行政处罚决定案.....	61
九、徐某峰、邓某霞诉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收养登记案	64

- 十、江某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举报答复意见案..67
- 十一、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申请强制执行履行征收补偿协议决定案.....70
- 十二、许某某、某汽车零件修理站分别诉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拆除行为及行政赔偿系列案.73

2022 年上海法院行政争议实质解决案例

案例一：陈某某诉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特殊工种工作年限认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20 年 8 月，陈某某通过上海某电器厂向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保中心）提出申请，要求认定 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3 月期间的特殊工种工龄年限。市社保中心受理后查明，陈某某在该期间系由上海某劳务公司派遣至该电器厂工作。2012 年 4 月，陈某某与电器厂正式签订《劳动合同书》。市社保中心遂作出办理情况回执，认定陈某某申请的业务不符合办理条件，故不予办理。陈某某认为，该期间，电器厂以接受劳务派遣的方式对其进行用工安排，由劳务派遣单位缴纳了社保，但其从事的高温岗位并非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工作，因此其与电器厂的事实劳动关系一直存在，市社保中心作出不予办理回执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损害了其正当利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不予办理回执，并责令市社保中心就陈某某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另查明，2012 年 4 月陈某某与电器厂签订劳动合同后，已认定其特殊工种工作年限 8 年 6 个月。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陈某某的诉讼请求后，陈某某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协调化解的主要做法

（一）追踪相似案件线索，探究类案核心争点

合议庭在审查本案的过程中发现，陈某某的同事张某某与其情况类似，在市社保中心不予受理后起诉至法院，未获支持。陈

某某称，两人虽然 2012 年 4 月之前是劳务派遣形式，但对于劳动者而言，始终是在电器厂从事特殊工种工作，距离可以享受提前退休的特殊工种工作人员的条件仅差半年；且由于电器厂迁移外地，两人均因此解除劳动合同，难以续接特殊工种的工作。在案件协调过程中，陈某某请求对两人 2012 年 4 月之前从事特殊工种的工作年限都予以认定。

通过两案事实比较，合议庭发现引发案件争议的实质在于陈某某、张某某满足按特殊工种退休的条件仅差半年工龄年限，而这半年由于原单位已搬迁至外省市，其无可能通过在原单位继续从事相关工作来累计接续。对此，合议庭围绕争议实质进一步从政策规定的实用性及合理性探索本案化解争议途径。

（二）联动社保部门及用工单位，研判两案争议化解方案

能否计入特殊工种工作年限，也即对何为单位职工的政策解释问题。为此，合议庭与市社保中心及市人社局进行工作联系，就相关政策解释问题进行沟通探讨，通过对沪劳保养发【2000】29 号《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本市从事特殊工种人员办理退休手续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研究，确定了特殊工种工龄的认定需满足两个基本条件：1. 单位经批准设有特殊工种；2. 该单位职工从事特殊工种。从陈某某、张某某的工作内容实质上评判，两人在此期间均符合上述标准，其诉求具有合理性。经法院组织，社保部门与电器厂就个案化解开始共同研判协调方案。

（三）依托政策和事实根据，一揽子解决行政争议

合议庭经研究后认为，对劳务派遣人员身份从事的特殊工种是否计入特殊工种工龄这一问题，相关规定本身并未作出明确限

定。政策发布时，劳务派遣形式在当时尚属新型用工方式，政策制定的目的在于对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有害身体健康的工种的相关人员，给予特殊的保护和照顾。特别是，陈某某、张某某从事特殊工种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合议庭鉴于政策制定的目的以及在案的事实依据，为彻底化解行政争议，向市社保中心发出了协调化解建议，市社保中心亦在收到合议庭协调化解建议函后，研判两案实际情况，同意将两案一并协调化解，一揽子解决涉案争议。经各方努力，陈某某、张某某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陈某某以诉讼目的已经达到为由，向法院撤回上诉及原审起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社保民生类案件，涉及特殊工种工龄认定问题，与职工提前退休密切相关，具有历史遗留性、复杂性以及政策性，往往涉及到从事特殊工种人员的身份认定、换岗后从事特殊工种工龄衔接不畅、政策理解机械化等诸多难题。本案通过对特殊工种政策中“何为单位职工”从立法目的角度进行解释，探究案件背后存在的合理性，联动社保、人保以及单位共同研究政策、查明事实依据，最终依托政策解读，向市社保中心提出可行的协调化解建议，取得案件实质化解。本案的成功化解是司法与行政机关多元协调化解机制的有效体现，既彰显了司法的温度，也展现了社保部门保障民生的速度，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案例二：姜某诉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湖南路派出所

行政处罚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姜某系网约车司机，第三人赵某系乘客。2022年2月，原告因行车路线问题与醉酒的第三人发生口角并引发肢体冲突，原告随即报警。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湖南路派出所调查后认为，双方因行车路线发生争执后互爆粗口，第三人继而挥拳打了原告头部，双方在纠纷升级过程中都使用了污言秽语，原告并非完全没有过错。第三人到案后对殴打原告的事实供认不讳，并表现出一定悔意。从原告伤情结果看，经医院检验没有发现原告头部有明显皮肤破损，也没有检验出其他明显伤情，不符合头部轻微伤的情形，被告遂结合上述因素综合认定第三人殴打他人，情节较轻，并对第三人作出罚款四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起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请求撤销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

二、协调化解的主要做法

（一）抽丝剥茧，寻找矛盾根源

案件受理后，原告对被告始终抱有较强的抵触情绪，多次强烈要求被告撤销原有的罚款决定，对第三人处以行政拘留。承办法官在与原告沟通过程中发现，原告是一名新时代青年，在坚持表达诉求的同时，能够耐心礼貌地倾听法院的释明，并非完全固执己见。为此，承办法官决定逐步抽丝剥茧，探寻原告内心真实意图，抓准矛盾根源为协调化解创造可能。经过深入的沟通，原告坦言，身为网约车司机，平时工作通宵达旦，曾多次受到乘客

刁难，身心俱疲，此番又受到第三人殴打，而对方仅仅罚款了事，心中气郁难解，此次诉讼就为争一口气。

（二）巧借“三合一”机制，凝聚化解合力

了解原委后，承办法官认识到该案不能简单一判了之，原告心中赌气，无论行政诉讼能否取得预期结果，都可能继续提起民事诉讼或多方投诉，对于当事各方都费时费力。为了实质性化解本案矛盾，实现争议的“一揽子解决”，承办法官决定本案采用庭审、旁听、讲评“三合一”方式开庭审理，巧借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契机，共同搭建化解平台，凝聚纠纷化解合力。经共同向第三人释明，第三人充分认识到了错误，并表示将积极配合好法院调解工作。

（三）趁热打铁，促使双方握手言和

庭审之前，承办法官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案例与原告进行深入沟通，同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原告态度逐渐缓和。庭审之后，又趁热打铁，在承办法官和被告主要负责人的共同主持下，原告与第三人面对面沟通，第三人向原告真挚道歉，并作出一定补偿，原告自愿撤诉，并表示不再提起民事诉讼。双方至此握手言和，争议得到圆满解决。

三、典型意义

行政案件庭审、旁听、讲评“三合一”机制是上海法治政府建设一张亮丽的名片，在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案当事人最终实现了从“动手”到“握手”的转变，使争议得到圆

满解决，其中包含了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为化解矛盾所作出的努力，是行政审判坚持贯彻司法为民宗旨，充分发挥“三合一”机制功能，努力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一次生动实践。

案例三：邱某诉华东师范大学退学批复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再审申请人邱某系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在提交毕业论文环节时提交了一份查重率较高的初稿，在学校某辅导员找其谈话后提出了退学申请，院校作出了同意退学的批复。但邱某在心理状态稳定之后认为当时其申请退学系学校存在误导，被诉批复决定存在问题，故向原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二审驳回其上诉，邱某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协调化解的主要做法

（一）摸清案情做工作

本案审理中，承办法官经听证、谈话，发现邱某平时成绩优秀，品行纯良，性格温和，但曾经患有抑郁症，在抑郁症活跃期时提交了有问题的毕业论文初稿，痊愈后懊悔不已。承办法官还发现校方与学生沟通时，未按照正式的程序步骤实施，对论文查重率高的实际原因也未召开相关学术委员会会议确认，导致邱某草草提出退学申请，引起学生及家长对学校相关程序缺失的异议。为此，承办法官与该高校取得沟通，充分释明涉案批复、决定在程序上可能存在的瑕疵。在法院的建议下，校方就本案重新启动内部讨论。

（二）上门协调促化解

为促进本案争议的实质解决，市高院专门向学校发出了协调化解矛盾建议函，说明本案中批准退学过程的举证、正当程序和人文关怀缺失存在问题，希望校方予以高度重视。庭领导带领合议庭、原审承办法官与该大学副校长、相关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科室主任、法务和代理律师在校区内就本案的进一步处理进行研讨，协商行政争议解决的方案。在讨论中，法院解释了邱某维权的出发点及达成和解方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确定了协调化解的大致方向和初步内容。充分沟通之后，校方改变了之前的强硬态度，主动表示愿意和邱某再次联系，并让相关学院领导研究细化矛盾化解的具体方案。

（三）疫情期间坚持调

在本案继续化解期间，本市爆发新冠疫情，承办法官和学校工作人员均居家办公，但并未影响案件的协调化解进度。疫情期间，承办法官克服困难，继续通过视频沟通、远程调处等各种方式与双方当事人沟通，寻求问题解决最佳路径，力促达成共识。经过不懈努力，再审申请人被承办法官的工作态度所感动，改变了最初不愿协调，坚持要求复学的执念，主动表示愿意协调，希望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使自己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学习。疫情逐渐平稳后，承办法官与再审申请人的母亲进行了数次深度沟通，希望从孩子未来发展考虑，理性权衡利弊，调整固有思维，让孩子尽快重启人生道路。考虑到再审申请人本人具有较高的学习潜质，但由于退学纠纷的影响，其人生境地处于停顿状态的实际情况，法官向双方当事人提出了建议性方案，即让再审申请人再参加一次研究生入学考试，尽早回归该校进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原有的学分和课时予以保留，直接进入毕业论文撰写阶段。经反复磨合与协商，双方当事人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方案。邱某和校方就恢复学籍事宜达成共识，邱某就本案提出撤诉，本案争议最终得以圆满化解。

（四）人文关怀促和谐

在本案中，合议庭秉持人文关怀理念，切实解决当事人实际问题，维护了患有抑郁症学生的合法权益，做到案结事了、实质化解争议。涉高校行政案件主要涉及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管理，因此既要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也要对学生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给予依法维护。合议庭对再审申请人在校学习期间的实际情况以及被诉退学批复决定作出时存在一定的程序欠缺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权衡考量，在厘清案情的前提下，采取了联动调解、上门化解、发送协调化解函等多层次化解方式，以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这起涉高校教育的行政争议得以实质解决。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涉高等教育类行政案件日渐增多，因涉及到高校学术自治等问题，该类案件受案范围、审理标准多有争议。本案历经三级法院审理，最终通过协调化解，形成了各方当事人均认同的化解方案，实质性地解决了教育管理争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案的处理维护了再审申请人的实体权利，也重新挽回了和谐的师生关系，获得学生和高校双方的充分认可。本案争议的成功化解，是行政审判中践行能动司法的生动案例，对处理同类涉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与争议化解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案例四：王安某、王庆某、王淑某、王定某诉上海市虹口区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征收补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涉案房屋原权利人王某某（1969 年去世）与第一任妻子郑某某（1945 年前去世）共生育 6 个子女，与第二任妻子冯某某共生育 4 个子女即四原告王安某、王庆某、王淑某、王定某。十七名第三人皆为王某某与郑某某的后代。王某某于 1949 年 4 月购买了本市霍山路一幢二层楼房。1990 年冯某某持 1986 年其缴纳地价税凭据领取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人登记为冯某某。2009 年经虹口区房地产测绘中心测算，房屋为三层楼房，总建筑面积 121.12 平方米。2021 年因霍山路房屋被征收，四原告与十七名第三人作为产权人共同与被告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虹口区房管局）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选择货币安置。四原告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为冯某某一人，冯某某仅生育四原告，所以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仅为四原告，十七名第三人参与签约系签约主体错误，故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请求判决确认被诉征收补偿协议无效，责令被告对四原告重新安置补偿。

二、协调化解的主要做法

本案受理后，法院在审查案件材料时发现被诉征收补偿协议签约人中 60 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了八成，急需获得补偿安置款以解决实际的居住需求或改善生活条件。四名原告与十七名第三人之间因为血缘、地缘等原因多年没有来往，感情基础薄弱，人数众多诉求不一致极易激化矛盾。合议庭在案件受理之初，就确立

了调判同步、双管齐下的基调，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抓住核心争议，实地调查走访，查清关键事实

经过详细审阅卷宗，合议庭精准把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霍山路房屋权利归属。面对原房屋买受人和多名知情人均已去世，相关法律法规和职权部门几经变更的现实困难，合议庭以 1949 年王某某的土地所有权状和 1993 年冯某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原点，前往虹口区档案馆、虹口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虹口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多方查证，找到了四原告在 2009 年申请房屋测绘时提交的虹口区房管局权籍科证明，为最终确认霍山路房屋属于王某某与冯某某夫妻共同财产增加了有力的事实证据。而在档案馆查找到的带有明确年龄的解放前户籍档案，更是成为说服四原告放弃主张冯某某的继承人仅为其四人的关键证据。

（二）数次辗转联系多地年老当事人，切实保障整户利益，引导解决共有根本纠纷

经过多次与当事人沟通，承办法官发现此案虽然人数众多，但分数两个阵营，且同一阵营内部意见相对统一并委托了同样的代理人。这让法官看到了推动纠纷实质性化解的切入点。在庭前会议中，承办法官向各方代理人出示了法院调取的几份关键证据，建议四原告放弃不切实际的主张，同时也向十七名第三人释明翻建主体是霍山路房屋翻建扩大部分利益归属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原告及第三人思考之际，承办法官又趁热打铁地让被告当庭计算出协议无效后该户巨大的利益损失，并提示该户人口众多，此番进入诉讼对他们本就薄弱的情感联系是极大的破坏，若协议无效，所有权利人重新签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告及第三

人的代理人在法院调取来的详实证据材料面前转变了诉讼策略，积极与各自的当事人沟通，引导双方坐到谈判桌上。

（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促成当庭和解，确保补偿落地

经过法官多次组织双方就征收补偿利益分配进行调解，双方的差距不断缩小。根据调判结合的审理思路，合议庭及时安排庭审，庭审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对原告及第三人顾虑的补偿款发放进度当场拍板，获得了当事人的信任。最终原告及第三人在庭审过程中打破隔阂，成功达成和解协议并当场撤回起诉。合议庭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提醒被告因补偿利益迟迟未能落袋，多名老人居无定所、权益受损的事实，督促被告经办人员在极短时间内开具结算单，并将征收补偿款发放到当事人手中，使当事人的利益得到了切实维护。

三、典型意义

上海作为一个老龄化趋势明显的城市，生活着许多高龄老人，他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同时也经历着这个城市的迭代更新。本案通过多方调查取证，从尘封的历史中厘清被征收房屋的权属来源和家族人员结构两条主线，查明案件事实及背景，为协调和解打下基础。本案的成功化解，及时维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其老有所居，避免损失扩大；同时再次印证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对于化解争议的决策导向作用，是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树立法治政府形象的重要抓手。

案例五：陆某某等诉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案

一、基本案情

被征收房屋系公房，原承租人嵇某某于 1994 年报死亡。嵇某某外甥即原告陆某某于 1993 年将户籍迁入被征收房屋内。2021 年 1 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该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嵇某某妻女皆在外地（江苏），且户籍从未报入此处，陆某某曾到物业公司进行承租人变更，但不符合相关规定，无法变更。兴城物业出具租用公房证明，明确被征收房屋的承租人为第三人上海虹房（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与第三人虹房集团签订征收征收补偿协议，明确征收补偿利益归虹房集团所有。原告陆某某主张，嵇某某体弱多病，经商量后同意原告为其养老送终，其将公房“留给”原告。经嵇某某申请，原告将户口于 1993 年迁入被征收房屋内，并实际居住照顾老人，为嵇某某料理后事，原告一家实际居住于被征收房屋内。原告应当享有被征收房屋的征收利益，故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请求判决确认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

二、协调化解的主要做法

（一）审查证据材料，摸清争议根本，厘清审查思路

合议庭收到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后，依法追加第三人，并对本案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发现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原告是否符合共同居住人的条件，其对被征收房屋是否享有权益。本案中，被告和第三人认为原告并非原承租人嵇某某的直系

亲属，也不满足变更承租人的条件，在原承租人死亡时在被征收房屋内实际居住不满一年，不符合共同居住人的条件，因此不能享有被征收房屋的征收利益。但根据已有证据显示，原告在嵇某某死亡之前即将户籍迁入被征收房屋，此后也一直居住其内，并缴纳房租及水电费用，实际成为共同居住人，第三人在此期间也未对被征收房屋的租赁权归属问题提出过异议，被告未考虑实际情况，与第三人签订的被诉协议事实上损害了原告的权益。

（二）庭前充分准备，开庭查明事实，庭后组织协商

经初步审查，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符合“共同居住人”的认定条件，是否有资格获得征收补偿利益。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开庭过程中承办法官对本案的证据材料以及原被告双方的意见仔细审查，厘清原被告双方的核心争点。庭后，针对庭审查明事实，承办法官积极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原告坚持认为其应当获得相应的征收补偿利益，希望在法院的主持下能与被告达成一致意见，但被告与第三人也坚持被诉征收补偿协议的效力没有问题。

（三）搭建解纷平台，组织多方调节，援引先例释明

在调解陷入困局后，合议庭经与被告、第三人协商，借助司法局积极搭建平台，就类案疑难问题召开研讨会，就法律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合议庭还对前期查询到的本市类似案件的裁判情况进行介绍，经过与会人员对征收补偿过程中特殊情形的深入讨论，被告和第三人对本案也达成共识，同意将征收补偿利益发放给原告，原告遂向法院撤回起诉，本案争议得以实质化解。

三、典型意义

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关乎人民群众的重大财产权益，实践中引发的争议较多。合议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为原告有理由相信其对被征收房屋具有相应权利，该信赖利益的产生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鉴于此，法院在协调化解中，对原告的上述权益给予充分保护，也确保公共利益得到维护，实现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同时，因公房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征收补偿过程中成为棘手的难题，给行政机关的征收工作以及法院的审查带来困惑，本案的处理不仅使行政争议得以实质性解决，也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司法审查有所启迪。

案例六：朱某诉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房屋所有权登记案

一、基本案情

朱某与夏某清（故）原系夫妻，夏某靖（原审第三人）系二人之女。2011 年朱某与夏某清协议离婚，约定：双方协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女儿夏某靖共有房屋一套（涉案房屋），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现夏某清自愿放弃上述房产中属于自己名下的产权份额，并全部归朱某所有，即离婚后，朱某拥有该房屋的三分之二产权份额，女儿夏某靖拥有该房屋的三分之一产权份额……该离婚协议书并经公证。2012 年，夏某清意外死亡。涉案房屋产权目前仍登记为朱某、夏某清、夏某靖共同共有。

2021 年 1 月，朱某至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以下简称市登记局）下属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离婚析产变更登记，将登记在夏某清名下的产权份额转移至朱某名下，并提交了申请材料。市登记局经审核后，认为因夏某清已死亡，登记机构无法仅依据朱某的单方申请办理配偶之间的变更登记，朱某提交的申请不符合法定要求，遂根据《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第 4.3.7 条规定，决定对其申请不予受理，并当场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朱某不服，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市登记局履行登记义务，将涉案房屋权利人变更登记为朱某、夏某靖所有。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朱某的诉讼请求。朱某不服，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协调化解的主要做法

（一）立足合法性审查厘清事实和法律问题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产权登记为

上诉人朱某、夏某清、夏某靖共同共有，系上诉人、夏某清两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登记。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市登记局将涉案房屋权利人变更登记为上诉人、夏某靖所有，涉及的是上诉人与夏某清对涉案房屋产权共同共有情形下的转移登记，依照《技术规定》所列登记类型，归属于《技术规定》第4.3.7条配偶之间变更房地产登记权利人的变更登记情形。依据该规定，登记为配偶双方共有的房地产变更为其中一方所有的，申请人应当是配偶双方。由于上诉人与夏某清离婚后未及时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导致之后关于涉案房屋的权利人变更问题复杂化。被上诉人从《技术规定》所列登记类型及相关规定要求出发，认为无法依据上诉人的单方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并无不当。

（二）裁判文书中载明协调化解方案

考虑到本案纠纷成因及客观事实情况，二审法院通过线上、线下多次与双方当事人沟通协商，开展协调化解工作，并向被上诉人发送矛盾协调化解建议函，被上诉人复函表示，经综合考量本案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且因另案民事诉讼中夏某清的法定继承人并未对涉案房屋主张继承权利，为配合法院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根据现行的沪规划资源规〔2021〕1号《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第4.3.7条等规定，上诉人及其女儿夏某靖可持本人身份证、房产权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等相关材料，重新申请办理登记。至此，上诉人的本案诉求事实上已经得到实现，本案行政争议已经得到实质化解。上诉人虽接受该协调化解方案，但依然坚持希望法院依法裁判。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并将案件协调化解情况及具体的矛盾协调化解方案在裁判文书中予以体现。

朱某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后，经高院法官耐心释明，其接受二审判决中载明的化解方案，撤回申诉，重新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至此，本案的行政争议最终得到实质化解。

三、典型意义

涉房屋登记类行政案件对行政相对人、相关人的财产利益影响重大，有时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潜在的矛盾纠纷。为避免程序空转和当事人诉累，审查此类案件不能仅局限于对登记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框框，而应综合考量个案实际情况，秉持能动司法理念，发现争议根源，积极破解僵局。本案裁判以合法性审查为前提，将协调化解过程和成果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充分阐明，为行政相对方的后续权利救济提供了具体指引，以判促调，定分止争。践行了司法为民宗旨，也为类似行政争议的处理提供了解决问题方向。

案例七：毕某诉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继续履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21年4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毕某承租的案涉房屋属于被征收范围内。6月，毕某与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黄浦房管局）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毕某按照协议约定搬离原址。根据协议约定，协议生效后90日内，黄浦房管局应向毕某支付人民币两百余万元。但毕某迟至11月下旬才拿到征收补偿款，选择的现房也拖延至2022年3月通知交房。原告毕某认为黄浦房管局上述行为属于违约，故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被告黄浦房管局支付违约金三万余元。

二、协调化解的主要做法

（一）耐心倾听，查明事实，体现司法温度

庭审当天，考虑到毕某夫妇年近八旬，且从松江赶至浦东，合议庭适当延后了开庭时间。由于两位老人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情绪激动，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做法较为抵触。合议庭在庭审中耐心倾听诉求、安抚情绪，梳理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对履行协议过程中涉及的搬离原址日、协议生效日、支付补偿款日等关键点一一仔细核实。毕某夫妇对行政机关有抵触情绪，多次信访，在庭审中表示自己不在乎违约金的数额，行政诉讼的目的只是为了出一口气，并不同意与被告协调化解。黄浦房管局认为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了补偿款，未违反协议约定。合议庭虽预判到本案化解纠纷的难度较大，但始终未放松协调化解工作。

庭审结束已临近中午，室外 40 度高温，审判长特意叮嘱书记员为两位老人送来了饼干和矿泉水，为老人提供生活保障支持。法院工作人员的体贴关怀，让毕某夫妇连连道谢，表示法院对老年人的关爱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

（二）送法上门，卸下心防，促成和解意向

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分歧太大，调解一度陷入僵局。为破解难题，合议庭通过仔细研究案情，寻找调解突破口，积极联络双方，沟通原告所担心的房屋质量、款项到账时间等问题，释法明理，支持当事人的合理诉求。承办法官诚恳务实的态度，赢得了原告的信任。本着自愿合法、公正高效、公开便民的原则，考虑到出行给毕某夫妇带来的不便，庭审结束几天后，承办法官与书记员驱车往返 120 余公里，顶着 40 度高温陪同两位老人至松江区房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完成相关手续后，又将两位老人送回住处并就地开起了调解会，送法上门。承办法官耐心细致地向毕某夫妇分析利弊、答疑解惑，两位老人理解了法官的善意，也与承办法官以心交心，坦诚道“自己是失独家庭，26 年前失去了女儿，成为了我们心中永远的痛。但这次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法院的关爱。”毕某夫妇逐步解开了郁结，平息了怨气，逐步回归理性，最终同意就本案争议进行实质性化解。

（三）厘清责任，协调沟通，跟进协议履行

根据查明的事实，承办法官初步做通原告工作后，趁热打铁，在查明事实、厘清责任基础上，适时开展调解工作，积极与黄浦房管局沟通协调。最终促使原被告双方就协议金额、履行时间、

履行方式等达成一致意见，并以行政调解书的裁判方式对双方的调解方案予以确认。在寄发调解书之后，承办法官仍持续跟进调解书履行进展情况，了解产权证书的发放情况，并敦促黄浦房管局采取上门服务等关爱老人措施尽快履行调解方案，两位老人亦表示今后再无诉讼和信访的必要了。

三、典型意义

“两旧一村”改造工作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就补偿安置问题达成行政协议，一经生效应当恪守诚信原则，严格按照协议履行义务。本案是一起法院着眼于当事人实质诉求，有针对性协调化解，有效平衡征收拆迁过程中各方主体利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最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典型案列。合议庭法官以深切的为民情怀，找准问题症结所在，将矛盾化解贯穿全流程；采取送法上门、背靠背调解、跟进履行等多种方法，成功化解了行政纠纷，使当事人有了切实的获得感，以实际行动让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触。

案例八：某汽车公司诉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0年期间，某汽车公司因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期限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企业年度报告被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管局（以下简称嘉定区市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经税务部门核实，该企业自2020年6月起即未按照规定申报纳税。后嘉定区市监局对该公司立案查处，至公司住所地进行现场检查，经检查现场无法找到公司人员，并经住所地的工业公司证实该公司已与所在地的经济小区失去联系。据此，经调查后认为某汽车公司存在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因登记住所地无法联系到该公司，嘉定区市监局遂于2022年1月在门户网站向某汽车公司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公告期满后，某汽车公司并未提出听证申请，嘉定区市监局作出了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并通过门户网站向公司公告送达了决定。该汽车公司不服行政处罚，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嘉定区市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恢复并换发营业执照。

二、协调化解的主要做法

（一）厘清争议焦点，把脉案件症结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某汽车公司表示其是某新媒体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改装类客车生产，该汽车生产资质在全国范围内具备一定的稀缺性，近年来因疫情影响存在生产经营困难的情况，某新媒体公司现处于破产清算状态，某汽车公司属于破产

清算范围，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的处罚将损害其企业经营自主权，并且影响某新媒体公司破产程序。同时，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在处罚程序中，未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方式向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所地送达执法文书，直接采用公告方式送达，损害了公司的知情异议权，存在程序瑕疵。原告表示愿意积极配合法院，希望通过本次诉讼能够恢复经营权限，实现企业财产价值，以便推进母公司某新媒体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合议庭在厘清案件争议后，对本案涉诉处罚决定的程序进行了梳理，发现被告在执法文书的送达程序上的确存在相应瑕疵，原告反映的企业经营情况及母公司正处于破产清算程序的情况亦属实。

（二）积极协调化解，助力困境企业恢复经营，依法保障债权人受偿权益

鉴于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在送达程序上有瑕疵，对某汽车公司的企业经营权产生了影响，同时某新媒体公司处于破产清算状态，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会影响企业破产清算程序推进，损害债权人受偿权益等实际情况，法院积极介入与双方进行协商沟通，一方面向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告知了原告起诉本案存在的现实原因和经营困难情况，并指出了其在送达程序中的瑕疵，另一方面与原告协商，了解企业现阶段的主要困难，并以此为切入点，磋商协调化解方案。经过各方反复沟通协商，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在合理考虑原告公司的客观情况后，承诺尽快帮助原告恢复营业执照并保障其破产清算完成，某汽车公司遂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本案争议得到实质性解决。

三、典型意义

中小微企业是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的有生力量。服务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发展，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本案中，法院立足于查明事实，考虑到某汽车公司经营范围与生产资质的特殊性，恢复其营业执照既能够保障其经营自主权，最大程度发挥企业价值，同时也可以助力其母公司实现债务清偿和破产重组，保障债权人的利益等，经沟通协调，行政机关在了解企业面临的困境后，帮助企业恢复了营业执照，助力企业有效推进破产重整。本案的成功化解，回应了市场主体的多元需求，是人民法院延伸司法职能，践行能动司法的生动体现，对保护中小微企业经营自主权，优化营商环境起到积极作用。同时，本案的处理也提示了行政机关规范执法程序，强化服务意识，体现法治的温度。

案例九：徐某峰、邓某霞诉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收养登记案

一、基本案情

徐某峰、邓某霞原为夫妻，婚后未生育子女。2004年，徐某峰拾得一名弃婴，报警后未见婴儿的亲生父母找寻遂共同抚养了该婴儿，取名徐某量，但未办理收养手续。2008年，徐某峰、邓某霞感情不和由法院判决离婚，因双方未办理收养徐某量的合法手续，法院对徐某量由谁抚养未作出处理，此后徐某量随徐某峰或邓某霞生活，期间，徐某峰再婚、离婚，邓某霞与徐某量年龄差不符合单独收养条件等因素，徐某峰及邓某霞均未提出收养徐某量申请。2021年，徐某峰、邓某霞再次登记结婚，并向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以下简称徐汇区民政局）提出收养徐某量的申请。徐汇区民政局受理后，经评估发现徐某峰个人信用部分存在贷记卡呆账和失信被执行人记录，根据《上海市收养评估办法》的规定，认定徐某峰、邓某霞收养能力评估不合格，遂作出不予收养登记通知并向两人送达。徐某峰、邓某霞不服，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不予收养登记通知，并出具收养登记证。

二、协调化解的主要做法

本案系民法典实施后上海市首起收养登记行政案件，案件的稳妥处理具有首案示范意义。为了充分保障徐某量的合法权益，法院多措并举促进案件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一）庭前数次在线谈话，了解原告家庭真实意愿

合议庭向徐某峰、邓某霞、徐某量了解情况，掌握徐某量主要生活、求学经历，知晓其对两原告的父母身份有较强认同感以

及愿意被二人收养的强烈意愿，并了解到徐某量因无合法身份，生活、求学等存在诸多不便。徐某量亦写信给法院，表示其从小与两原告以父子、母子相称，生活幸福，没有户口以致学习、生活与他人不同，希望能够办理收养，让其获得正常生活。

（二）厘清相关法律法规，与民政部门充分沟通研讨

合议庭注意到，2021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收养评估实施办法》对收养能力评估采取打分制，附件《收养能力综合评定表》中“道德品行”栏，把“个人信用不良记录”并列“违法犯罪记录”列入0分项，是引发本案争议的主要症结点。疫情期间，合议庭克服封控实际困难，就两原告是否符合收养条件与徐汇区民政局进行多次沟通，并由审判长牵头就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与市民政局召开视频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评估实施办法对规范收养评估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本案具有特殊性，所涉收养行为发生于2004年，申请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抚养关系，有较稳定的感情基础，在法律适用上要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三）发送协调化解矛盾建议函，因案制宜解决收养争议

在就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讨论沟通的基础上，法院向徐汇区民政局发送协调化解矛盾建议函，建议该局充分考虑本案特殊情况，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角度出发，本着实事求是、为民解困的精神予以研究解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徐汇民政局收到建议函后，在上海市民政局的指导下，为两原告办理了收养登记。两原告取得收养证后立即致电法院告知结果，当日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并由衷感谢法院多次协调。

三、典型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未成年人成长的摇篮。维护家庭和谐稳定、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是审判工作的重要职责。本案审理中，法院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积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在解决收养关系争议时，一是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情感意愿，秉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理念；二是强调维护家庭关系稳定，本案收养关系的双方情感深厚、收养意愿强烈，通过法院做工作，民政部门依法为原告方办理收养登记，确认了收养关系和家庭关系，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三是回应了人民群众对行政审判的新期待，两原告表示其为了顺利收养曾历经曲折，亦考虑通过信访解决，但法院认真、耐心、细致的工作，解开了全家的心结，并感谢法院为民解忧，真心为群众办实事。本案是行政审判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

案例十：江某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举报答复意见案

一、基本案情

202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人行上海分行）收到江某提交的举报信，要求人行上海分行依法调查并给予处罚。人行上海分行作出《举报答复意见书》，答复江某：关于某支付公司提供资金结算业务的调查情况：关于来信反映“为何事后开通快捷支付”、“为何事后迟迟不断开某网络科技公司的支付接口”的问题，不再重复答复。关于来信反映的问题，根据现有调查情况，未发现某支付公司存在违反支付结算管理规定的情形。关于来信其他诉求事项：有关民事纠纷的问题，应通过司法途径或自行协商解决。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人行上海分行将敦促相关非银行支付机构积极配合有权部门开展工作。江某不服该答复，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人行上海分行作出的《举报答复意见书》并重新答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江某的起诉。一审裁定作出后，江某不服，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上诉。

二、协调化解的主要做法

二审法院就案涉争议组织上诉人江某与被上诉人人行上海分行进行了审理，期间的主要化解工作和方式为：

（一）耐心听取当事人诉辩意见，询问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缘由和动机

通过询问，承办法官逐渐明晰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实际诉求在于关联民事争议，即意图通过行政诉讼取得民事案件提起再审的依据，使自己的资金损失在民事案件中得到赔偿。

（二）积极回应当事人诉求，引导当事人建立合理诉讼预期

上诉人向法庭陈述其诉求后，承办法官首先向上诉人释明其诉求中哪些内容属于合理请求，哪些请求内容依据不足。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法庭耐心向上诉人释明法律规定，其资金损失与被上诉人的履职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举报经调查核实作出的答复亦未对上诉人设定权利义务，故法庭难以采纳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其次，法庭要求被上诉人围绕上诉人的相关诉求及其履职过程中的职权、程序问题做出说明，特别就上诉人存疑的其资金投放过程中的“代收付”“快捷支付”“授权”与“签约”等行为在行政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及监管执法中的认定标准进行阐释。最后，法庭根据案件事实和当事人诉辩意见，积极引导当事人形成合理的诉讼预期。在凝聚共识、增进理解的基础上，稳妥推进争议的协商解决。

（三）强化能动司法，以民、行关联纠纷协同处理推动实质性解决争议

审理中，合议庭秉持能动司法的理念，聚焦民事纠纷与行政案件的协同处置，在上诉人的合理诉求与被上诉人的履职要求之间寻找平衡点，督促被上诉人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经充分沟通，被上诉人当庭表示，其对上诉人提出的细化答复内容的合理诉求予以理解，并将根据法庭释明的要求对上诉人的申请作进一步答复，为上诉人民事争议的解决提供支持。通过法庭的耐心沟通与释法明理，上诉人认识到再坚持本案行政诉讼的已无实际意义，遂当庭提交撤诉申请书，向法院撤回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行政争议与关联民事纠纷协同化解的案例。审理中，合议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行政机关和金融消费者之间积极搭建有效沟通的桥梁，以此推进行政案件与关联民事纠纷联动解决，达到了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目标，提高了案件当事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通过本案争议的化解，也督促了金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案例十一：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申请强制执行履行征收补偿协议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8月22日，申请执行人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与张某(户)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对上海市浦东新区某处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补偿。后张某去世，其继承人张某某等拒绝履行征收补偿协议内容。申请执行人于2020年8月4日向张某某等人送达《催告函》，要求自接到催告书之日起至2020年8月18日完成交房搬迁义务，张某某等逾期仍然拒不搬迁。申请执行人于2021年3月10日作出《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决定书》。张某某等收到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决定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送达催告书，催告其在收到催告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自觉履行义务，因逾期仍未履行，故申请执行人以张某某等为被执行人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法院审查，认为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合法，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已经保障被执行人合法权益，遂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行政裁定书送达后，法院持续跟进化解，被执行人在收到裁定书后自觉履行征收补偿协议义务，所涉行政争议成功化解。

二、协调化解的主要做法

（一）全面厘清案件争议焦点，求同存异探求矛盾化解突破口

涉案地块为上海市旧城区改建项目地块，被执行人“签而未搬”对相关重大民生工程项目的顺利推进造成影响。合议庭收到强制执行申请后，针对申请执行流程、征收补偿利益是否足额充分、可执行性等问题进行了重点审查。为深入了解被执行人关于征收补偿的实际想法，探寻签约后反悔的真实原因，合议庭第一时间组织上门现场查勘，与该户家庭成员分别谈话，悉心听取被执行人诉求，针对被执行人提出的原签约人死亡后要求分户征收补偿、对无证建筑要求补偿等纠结点进行释法明理，使被执行人对征收补偿利益的预期合理化。组织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就地开展协调化解工作，对合理诉求部分予以充分考虑，在争议中寻求平衡，找寻协调化解突破口。

（二）执行审查与协调化解同步推进，依法裁判促使当事人回归理性

在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同时，针对被执行人家庭内部短期内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且部分家庭成员存在不切实际的征收补偿要求的情况，合议庭于3个工作日内完成阅卷、沟通、现场查勘、谈话、评议审查工作并作出准予执行裁定。同时，敦促申请执行人配合法院出具符合该户实际的协调化解方案，送达裁判文书的同时一并告知被执行人家庭成员，陈晓利害得失，促使被执行人回归理性。

（三）“以裁促调”跟进解纷，平衡公共利益与被征收人合法权益

行政裁定书送达后，合议庭洞悉被执行人部分家庭成员的情绪有所缓解，于是及时跟进，与被执行人家庭人员分别沟通，使该户的心理预期调整到合理范围内，并积极为被执行人家庭内部关于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免除其后顾之忧。同时，敦促申请执行人根据新情况提供可供选择的合理解决方案。最终被执行人家庭内部终于协商一致，愿意履行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自行搬离被征收房屋，争议得以实质性化解，保障了被征收人合法权益和旧改征收项目的有序推进。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本市首例房屋征收部门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而未搬”，行政机关作出履行征收补偿协议决定后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通过首案的非诉合法性审查，明确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领域履行征收补偿协议决定类强制执行案件的审查方式。对“签而未搬”申请非诉执行案件，通过卷宗材料审查、实地查勘调查、听取各方意见等各环节工作，在申请执行、沟通协调、执法程序等方面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为“签而未搬”情形的处理提供了相应的法律预期与解决路径。案件审结后，法院持续跟进解纷，最终使纠纷圆满解决，体现了人民法院在践行能动司法理念，维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和保障旧改民生工程顺利推进上的责任担当，彰显了行政审判在服务保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方面的重要作用。

案例十二：许某某、某汽车零件修理站分别诉上海市松江区 叶榭镇人民政府拆除行为及行政赔偿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许某某分别以其个人和汽车零件修理站的名义与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房屋转让协议，购得原村集体搭建的办公楼一幢及农用平房两间（以下简称案涉建筑），一并作为汽车零件修理站经营使用。被告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经核查发现案涉建筑属于未经法定审批手续批准建造的非农设施，根据整治要求应当予以拆除，遂在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实施了拆除行为，并将拆除现场清理后复垦。原告与被告及村委会沟通未果后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被告拆除行为违法并赔偿案涉建筑内设备及附属设施损失。诉讼中，原告另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原告与村委会签订的购房协议无效且返还购房款及利息，并赔偿行政诉讼中无法处理的建筑内设备及附属设施损失。

二、协调化解的主要做法

（一）疫情期间不停摆，运用“微法庭”厘清争议，明确化解思路

系列案件立案后，恰逢本市新冠疫情爆发，为切实回应当事人迫切的司法需求，合议庭通过开展线上“微法庭”的形式和原被告进行沟通，确保办案不停摆。经深入了解，本案争议是在松江区“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过程中产生。为整治需要，被

告通过与相对人进行协商后采取“先拆除后补偿”的方式推进工作。但就案涉建筑被拆除前原告许某某本人是否与被告进行过协商且表示同意，以及原告何时知晓系被告实施拆除行为等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且均无法充分举证。经过数次沟通，合议庭注意到原告对于案涉建筑本身的违法性具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所提出的赔偿金额也非畸高；被告虽表示是经许某某儿子同意后拆除案涉建筑，但在此后并未达成一致的补偿方案。现双方均有一定的协调化解意愿，但具体的损失项目及金额尚有争议，加之行政案件、民事案件交织，需要妥善处理行、民关系。为了避免办案陷入僵局，合议庭认为案件最宜通过协调化解“一揽子”解决争议，并拟定了具体方案。

（二）立足化解方案，多措并举分步推进，打通解纷神经末梢

根据方案，合议庭分三步推进争议化解工作：第一步，借助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向被告出庭应诉领导充分释明涉案拆除行为的违法性及若败诉可能对其开展整治工作的成效以及法治政府形象产生不良影响，以此敦促被告将应诉重心转移至实质化解争议。第二步，行、民联动，梳理系争赔偿项目结构，奠定化解基础。合议庭首先随机走访了本市几家汽车零件修理店，就原告主张的设施设备进行询价；然后与上海市松江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民事案件的法官取得沟通，就案涉争议及赔偿内容交换了意见。第三步，探明原告需求，降低不合理预期。合议庭向原告耐心分析了现有的法律规定以及诉讼的可能走向，从诉讼风

险、维权成本等予以释明引导，敦促其回归理性协商、尽早化解争议的路线上。

（三）借力府院互动，制作化解矛盾建议函，一槌定音止纷争

为了进一步发挥司法在多元解纷机制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闵行法院与松江区司法局签署了《松江区行政争议协调化解合作协议书》，以便于充分发挥属地化解的地域、信息、资源优势。本案审理期间正值松江行政争议协调化解工作室成立，合议庭通过委托该工作室介入争议化解。工作室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法律顾问咨询等方式，为被告及村委会在实质化解案涉争议上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和建议，闵行法院向被告发送了《协助化解矛盾建议函》，打消了被告及村委会的顾虑。最终经多方商定，由村委会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原告一并撤回行政、民事诉讼共六起案件。调解协议于结案后已履行完毕，案涉争议得以实质性化解。

三、典型意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本系列案件争议的背景是乡村环境综合整治，考虑到本市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要义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社会价值，在原被告双方就各自主张均无法充分举证的情况下，法院并未对系列案件径行裁判，而是围绕各方实质争议，积极实践“枫桥经验”。通过庭审固定意见，借助府院平台联动、跨区域民行互动，发送协助化解矛盾建议函等环节，渐进式推进协调化解工作，最终实质解决了行政争议。本次系列案件

的成功化解，综合了实质解纷的多种方法和经验，对于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调处模式。